

“張氏之山”和大觀園

范若恩

[提 要] 張南垣為明清易代之際造園巨匠,主導了中國園林風格在這一時期的突變,其家族作品被譽為“張氏之山”。《紅樓夢》對於大觀園形貌的描寫表明,大觀園相當部分的修建具有典型的張氏之山的特點。在此基礎之上,如果進一步探求張南垣代表性園林作品背後的歷史,寄暢、樂郊等早期張氏之山為《紅樓夢》提供了部分故事的素材;而西田等晚期張氏之山則為《紅樓夢》提供了稻香村這一大觀園另類建築的原型以及懺悔和夢覺的意境。這也為思考《紅樓夢》後四十回續書中蘭桂齊芳等故事的合理性、《紅樓夢》的政治傾向和悲劇性等若干問題開闢了新的空間。

[關鍵詞] 《紅樓夢》 大觀園 張南垣

[中圖分類號] I206.2; J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1 - 0163 - 10

就大觀園之原型,學界研究,雖無定論,或可大致分為單一原型說和多源融合說等。自清中葉以來,明義、袁枚、胡適、吳世昌等持隨園說,後人延之,則相繼有恭王府說、暢春園說、圓明園說等,可謂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袁枚隨園說本身就遭其孫“吾祖謫言”之否定,後更由顧頡剛、俞平伯、卞孝萱等考證其歷史變遷,實非曹家舊園。^①俞平伯在否定隨園說時曾言,“《紅樓夢》之在南京,已無確實的證據,除非拉些書中花草來作證”。^②迄今為止,更無一處園林能完全符合曹雪芹對大觀園的描述,對於這座“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大觀園,多源融合說似更為合理。乾嘉年間二知道人即指出此園為曹雪芹平生經歷所化,“大觀園之結構,即雪芹胸中邱壑也,老去吐之於筆耳”。^③1924 年俞平伯提出曹雪芹“寫大觀園是綜合南北的芳韶風物”,^④1935 年藏雲提出大觀園融合中國北方的苑囿和南方的庭園兩種園林系統,“受當時皇家園林城內如三海(中海南海北海)城外西郊暢春園,圓明園,長春園諸御苑的影響極大”。^⑤馮其庸先生也認為大觀園兼融南北園林勝跡,是曹雪芹“對當時建築藝術成就的藝術綜合,是一次文學的再創造……而不是一座現場建築刻板式的描寫”。^⑥

但多源融合說有待細分源頭,才不至籠統。正如脂硯齋在庚辰本第十七回夾批大觀園形貌中所說:“此回乃一部之綱緒,不得不細寫,尤不可不細批註”(第 350 頁),^⑦如能將大觀園不同源頭及其寓意詳細加以梳理,當可為我們解讀《紅樓夢》提供幫助。在這一方面,藏雲做了極具啟發性的辨析。他在充分肯定了南方園林對大觀園的影響之外,專門分析了大觀園的規模和園中與其他景致格格不入的稻香村與北方苑囿的關係。他指出第十六回中賈府為建大觀園“起自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表明大觀園面積甚至超過了王府規制,只可能是“近於北方的苑囿系統,它的結

構,必受著當時皇家園林的暗示無疑”。同時,他認為稻香村“是私家園林絕不能應有的……土井桔槔轆轤,都是北方農田常有設備。此種格局乃御苑中為天子觀稼親農而設,私家園林何得有此?”由此,他認為大觀園是“(融合南方庭園系統浸潤後的)苑囿和庭園兩種系統而成的一個私家園林”。^⑧但是,第十七回形容賈政等人在園中遊覽為“盤旋曲折”,脂硯齋批為“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隱之巧可知”。(第361頁)可見最終建成的大觀園面積不大。此外,據柯律格(Craig Klunas)考證,晚明之前的江南園林原本具有相當的農業生產功能;如明初吳庸建於蘇州的名園東莊即有稻畦、果林、菜圃等,拙政園一半的面積為經濟類果林。^⑨又如,太倉安氏園“其右與其陰皆稻田,藩其右以為圃……中有亭一,茅舍一”。^⑩王時敏家族的樂郊園在明末王時敏聘請造園巨匠張南垣改建之前,原有“平疇百十頃,看耕稼”。^⑪生產功能在晚明退出江南園林,象徵著當時社會奢靡之風日盛。而歷經明清鼎革滄桑之後,王時敏再次邀請張南垣為其另建西田以歸農避世,後者則完全為農舍田園樣式,其中主建築之一則為稻香庵。而僧蒼雪造訪西田後留下詩句“桔槔聲裏屬柴桑,曾向名庵訪稻香”,^⑫土井和桔槔一一在列。可見,稻香村乃至大觀園複雜的源頭還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從以上討論可見,大觀園其地雖不一定在南方,但它和江南園林之間的關係亟待梳理。清初張潮《虞初新志》集明末清初奇人故事,在清代影響甚廣,其與《紅樓夢》內在聯繫,尚未有系統研究。《虞初新志》所錄馮小青、林四娘等人故事,在《紅樓夢》中均可找到對應情節或人物。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小青傳》中的馮小青故事和香菱、黛玉的遭遇。馮小青色藝雙絕,嫁為妾室,被大婦所妒,幽禁折磨至死,明人以此創作戲劇《療妒羹》。這對應著紅樓夢中香菱被夏金桂迫害的命運和賈寶玉為治療夏金桂妒病去尋的療妒湯。馮小青與黛玉均有臨終焚稿故事,馮臨終焚稿所吟詩句直接被化入黛玉在第八十九回病中喟歎。^⑬《林四娘記》中的青州女鬼林四娘直接變為第七十八回《老學士閒徵姬媼詞,癡公子杜撰芙蓉誄》中賈家三子歌詠的青州恒王姬妾林四娘。《虞初新志》中另錄有吳偉業傳世名篇之一《張南垣傳》,其生動精煉地記錄了明清易代之際造園巨匠張南垣的生平和造園理念。《紅樓夢》第十六回提及大觀園設計者為“一個老明公號山子野者”,脂硯齋旁批為“妙號,隨事生名”(第338頁),第十七回借眾清客稱其“胸中大有邱壑”(第350頁)。清初另有以造園事業名動南北的“山子張”家族——張南垣子孫兩代均為清朝內廷供奉,“諸王公園林,皆成翁手”,^⑭參與建造瀛台、玉泉、暢春等皇家園林和王公貴族的萬柳堂、怡園等,被稱為“山子張”或“山石張”。^⑮張南垣本人更由《清史稿》為其作傳,^⑯歷史上以造園疊山技業而名垂正史者,唯此一人。王時敏稱其園林“直奪天工”,^⑰秦松齡在《無錫縣志》中稱其“宛然天開,盡變前人成法,以自名其家”,^⑱《虞初新志》贊“其胸中邱壑,較之畫家為難”,其領導園林風格突變,“遍大江南北,有名公卿間,人見之不問而知張氏之山也”。^⑲藏雲、周汝昌、李希凡等學者已初步推測山子野係比附山子張而出。^⑳

本文通過研究第十七回所展現的園林風貌,指出大觀園相當部分的修建具有鮮明的張氏之山的特質,與吳偉業廣為流傳的《張南垣傳》遙相呼應。但清初留存江南的張氏之山,並非僅以其獨特風貌聞名。它們蘊含着板蕩之際江南大家族種種令人唏噓的遭遇和衰頹復振的悲喜故事,更以寄託其中的複雜遺民心態,被時人視為特殊歷史和悲劇寓意的象徵。秦氏寄暢園有着近似賈府的秦道然被雍正抄家問罪、其子秦蕙田中舉救父的傳奇。王時敏家族有着類似的復興故事,他筆下的樂郊園更象徵著舊日奢靡的記憶。作為樂郊園的轉生和對立面,王時敏清初另造西田,這座樸素農舍形態的園林一改樂郊的奢華,充滿着對前代的記憶和懺悔,承載着遺民黍離秋槐之痛,更和吳偉

業的梅村等都蘊含着夢覺的意境。《紅樓夢》將大觀園納入張氏之山的譜系中,也直接或間接地借用了其背後種種故事和意蘊:大觀園是《紅樓夢》中的寄暢或樂郊,它的後世稻香村却提早降臨,更是對一夢不覺的賈府乃至時代無聲的警告。這也將為重思《紅樓夢》後四十回中蘭桂齊芳等飽受批評的“光明的尾巴”的故事的合理性、《紅樓夢》的政治傾向和悲劇性等若干重要問題提供新的空間。

一、大觀園和張氏之山

如上所述,大觀園風貌博取眾家。如賈政等人遊覽河岸時,見“池邊兩行垂柳,雜著桃杏,遮天蔽日……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第362頁),這裡可能是接受了計成《園冶》中“橋橫跨水……溪灣柳間栽桃”的思想。^②賈寶玉批評稻香村人力造作,遠不及有鳳來儀“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鑿”,其專門強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第360頁),則是語出計成之“境仿瀛壺,天然圖畫,意盡林泉之僻,樂餘園圃之間”。^③然而,天然圖畫雖文字出於計成,其意境却源於張南垣或張氏之山。曹汛等學者考證,計成《園冶》中的造園思想深受更早成名的張南垣影響。^④與此同時,寶玉“天然圖畫”之語或來自“今人”圓明園四十景之一的“天然圖畫”,而後者具有張氏之山獨有的特點。“天然圖畫”於雍正五年掛匾,雍正乾隆均題詩讚頌。這一院落舊名竹子院,遍地修竹,雍正詩歌描述其“深院溪流轉,回廊竹徑通。珊珊鳴碎玉,嫋嫋弄清風”,^⑤與“千百竿翠竹遮映……清泉一派……灌入牆內,繞階隨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第354頁)的“有鳳來儀”相仿佛。乾隆在其詩的序中,讚揚從天然圖畫遙望遠方,“遠近勝概,歷歷奔赴,殆非荊關筆墨能到”。^⑥計成曾言其園林如“荊、關之繪”,^⑦但乾隆實則表明“天然圖畫”中山水動態“奔赴”的特點使之超越了計成園林境界。張南垣設計的園林形貌經由吳偉業的《張南垣傳》名揚天下,吳文稱張氏作品最大特徵之一即為善使山勢“奔注”,更稱正是這一特點昇華了具有“荊、關老筆”之畫意的疊山作品,使之“全體飛動,蒼然不群”。^⑧由此可見,乾隆的“天然圖畫”或寶玉心中具有此類意境的大觀園“有鳳來儀”等景致或為張氏之山的化身。

而細讀吳偉業文字和《紅樓夢》第十七回其他處關於大觀園的描寫,則更能看出這一點。吳偉業對張南垣的歷史地位和設計理念作出了形象生動的總結: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為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為此技者類學嶄岩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日峯,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闔,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絙,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剺顏刻字,鉤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鉤巾棘履,拾級數折,偃僂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為山者耶?今夫群峯造天,深巖蔽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為,非人力所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唯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陀,版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峯絕嶂,疊疊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為獅蹲,為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為吾有也。方塘石湫,易以曲岸迴沙;邃閨雕楹,改為青扉白屋……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煙雲渲染,補入無痕。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

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②

從吳文中可見，張南垣在疊山方面一改前代在有限的庭園中盲目追求以危峯巨石起崇山峻嶺的穿鑿，轉而提倡追求象外之境的古人畫意。他以土中戴石，營建或平緩或起伏的大小土山，造曲折逶迤奔騰綿延之勢，輔之適當疊石放置以及低牆密竹的遮掩，再結合巧妙的位置和走向安排，採取借景手法，使園中有限之假山一望恍若園外天然大山餘脈，直與遠方無限之奇峯絕嶂相連，變山在園中之具象為園在山中之意境。而逶迤山勢的奔騰起伏使山在局部形成“伏而起，突而怒，為獅蹲，為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的動態視覺效果。第十七回中，眾人甫進大觀園，便見翠嶂“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第 350 頁），與之類似。在遊園中，見“青山斜阻”（第 357 頁），更見“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第 362 頁），遊園既終，“大山阻路，眾人都道：‘迷了路了’，然而“由山腳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闊大路”（第 372 頁），則都是在張氏之山的意境中盤旋，其感受如脂硯齋評論“大山所分之脈”時言“不寫主山，而主山處處映帶連絡不斷可知矣”（第 362 頁）。第十八回黛玉和惜春描繪大觀園山水的詩更進一步表明“若似乎奇峯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的借景效果——黛玉認為大觀園“借得山川秀”（第 393 頁）；惜春最具畫才，她眼中的大觀園更是“山水橫拖千里外”（第 292 頁）。或者，此亦如陸燕喆評價張氏之山所言，“居山中者，幾忘……吾山之非山也”。^③

李紉在第十八回詩“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第 292 頁），此句甚近王士禎和趙翼等“張南垣以為假山，峯壑湍瀨，曲折平遠，巧奪化工”。^④第十七回另形容蓼汀花溼“曲折縈迂”（第 361 頁），則表明大觀園在理水方面近張氏之山的“曲岸回沙”。^⑤在宏觀之外，此類有限面積內曲折逶迤的疊山理水，產生的近距離觀賞體驗，特別適合位於城市的賈府之類宅邸。戴名世等認為張氏之山“雖在塵囂中，如入巖谷”，^⑥“半畝之地，經其點竄，猶居深谷”。^⑦而如脂評所述，眾人游賞“全是曲折，掩隱之巧可知”（第 361 頁），其評“青山斜阻”之時，點出“諸釵所居之地……都相隔不遠，究竟只在一隅，然處置得巧妙，使人見其千邱萬壑，恍然不知所窮……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之穿插佈置耳”（第 357 頁）。現存傳記中關於張氏之山中溪流泉水的進一步敘述甚少，但以張氏補入無痕、雅和自然的理念，溪泉當與山石花木屋舍窅然一體。大觀園有鳳來儀“清泉一派……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第 354 頁），繼而山中“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於石隙之中”（第 352 頁），這或可以與清初人士對無錫秦氏寄暢園泉澗的記載比較。寄暢園康熙初年經由張南垣和其侄張弢改建，康熙乾隆南巡時多次駐蹕。寄暢園以“（惠）山之山為其山，山之水為其水”，“晝夜潏潏然潏潏澗澗瀉於簷楹之下”。^⑧孔尚任贊其引惠泉之妙“最難活水利於階除”，^⑨康熙十六年邵長蘅《遊慧山園記》記載改建後的寄暢園“蒼翠欲滴，泉石灑潏”，^⑩吳偉業有“石斷源何處，涓涓樹底生”，^⑪乾隆十六年，秦實然和乾隆詩時亦有“水流花徑石潺潺”。^⑫

在建築和器物方面，吳文總結張氏“邃闔雕楹，改為青扉白屋……窗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改富麗奢靡為清雅自然。其設計既全域在胸，又因地制宜，細微入扣，“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岩壑已具……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第十七回眾人遊園，正門“那門欄窗櫺……並無朱粉塗飾……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第 349～350 頁）。園中部分建築，如有鳳來儀和蘅蕪苑等，均是“粉垣”、“清廈……綠窗油壁，更比前幾處清雅不同”（第 354、364 頁）。第四十二回寶釵談論大觀園，“這園子却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第 973 頁）。而據賈政和賈珍在有鳳來儀的交談，園內建築內部陳設

“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準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第356頁)。

二、《陳情表》與蘭桂齊芳：早期張氏之山之於《紅樓夢》

綜上，大觀園在局部具有鮮明的張氏之山的特點。在此基礎之上，如果進一步探求寄暢園和樂郊等張南垣代表性園林作品和園主在清初政治中的複雜遭遇，江南的“張氏之山”背後的歷史甚至比曹雪芹家族更接近《紅樓夢》中部分故事。

寄暢園為東南名園之一，康熙初年經園主秦德藻延請張南垣和其侄張弼進行了大規模改建。秦德藻之子秦松齡與曹雪芹祖父曹寅交好，秦松齡曾為曹寅《楸亭夜話圖》題詠，曹寅亦為寄暢園中臥雲堂等題詩。清帝對寄暢園的喜愛，不亞於對曹家，康熙乾隆二帝每次南巡時，必駕臨寄暢園，乾隆多次題詩讚歎寄暢園之清幽，更在清漪園中仿建有諧趣園。

秦松齡本人所作的《無錫縣誌》載其聘請張南垣叔侄改建寄暢園後，“園成，向之所推為一切名勝者，一切皆廢”。^⑨這與賈府拆毀會芳園興建大觀園相仿佛。《紅樓夢》秦可卿喪命之地為天香樓，秦氏寄暢園中在康熙年間也建有天香樓。^⑩在此之外，寄暢園得名伊始，便和秦氏這樣詩禮簪纓的望族多舛的政治命運相聯繫。萬曆年間園主秦耀被誣解官，赴京待罪，1599年修繕家中園林鳳谷行窩，改名寄暢，以舒抑鬱。其孫秦松齡於順治十二年中進士，任國史館檢討，後兩次被罷官。^⑪此後，寄暢園更加離奇的遭遇，似乎成為《紅樓夢》蘭桂齊芳等故事的源頭。秦松齡子秦道然以其才學，被康熙指定為九皇子胤禔老師，雍正即位後，殘酷打擊曾經與其爭奪帝位的諸皇子，秦道然革職下獄後被重罰十萬兩銀充餉，其無力承擔，被交由地方永久圈禁，寄暢園等家產則抄沒入官。^⑫雍正時期秦家寄暢園的遭遇，與曹家和《紅樓夢》中賈家捲入宮廷政治鬥爭後的敗落類似。秦道然子秦蕙田於乾隆元年中探花，入值南書房，乾隆二年痛上陳情表，願以官職為秦道然贖罪，乾隆深為感動，遂釋放秦道然並發還園產。^⑬這一戲劇性變化，却是曹雪芹家族所無，它較之曹家更接近《紅樓夢》後四十回中的賈家蘭桂齊芳、沐皇恩延世澤的故事。秦氏經此大難，合族議定在園中建家祠雙孝祠，將寄暢園變為祠產，試圖使之“永垂不朽”，^⑭《紅樓夢》中則有秦可卿托夢叮囑鳳姐祖塋附近多置田產房舍，“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第271頁)，兩者設想如出一轍。

此類家族一敗塗地而後蘭桂齊芳的故事同樣發生在另一座張氏之山中，後者較之秦氏的政治遭遇更接近賈府內有紙醉金迷、刁奴欺哄，外有時局壓迫下的經濟衰敗。王時敏在明末聘請張南垣改建樂郊園。王時敏少年時如賈府諸人不通經濟、一味高樂“承先世餘蔭，昧於治生，目不識秤，手不操算。惟於泉石癖人膏肓……一往乘興，不顧其後”，甚至如賈府一般修建園林導致家道中落，“漸至垂橐不支”。^⑮此外，他亦如賈府任由奴僕哄騙侵吞，“不事生產，又復漸萌侈心，鄭驛郇廚，賓朋踵屬，西園東墅，土木煩興，兼僕輩奢汰成風，侵牟沿習，競為竊轡，莫塞漏卮。先世所付典貲，不幾年而蕩掃，根本有拔”。^⑯江南大家族在經歷明末清初兵火後，多難以為繼，順治十八年江南奏銷之禍中，“十室九懸罄”，王時敏的兩個兒子更因抗糧被革去功名，王家墮入赤貧狀態，“人但知我貧，豈知我一貧至此”。《紅樓夢》中賈家逐漸衰敗後靠典當過節般，王家七夕節禮、上元家祭等已無法支撐，甚至連子女出生，五分接生銀都無從籌措。^⑰王時敏亦如同賈母散餘資，不得不將樂郊園一分為四，令各房各自生活，後又多次分田。亦如賈寶玉和賈蘭叔侄同時中舉，王時敏第八子王揆和孫王原祁在康熙八年同科中進士，使陷入極度窘迫狀態的王家得以中興。

秦王兩家在清初具有巨大的社會聲望，上述兩大家族故事本身具有高度的戲劇性，在清代得以

廣泛傳播。《紅樓夢》後四十回續書中蘭桂齊芳等故事曾長時間被批評為封建社會“留下光明的尾巴”。但後四十回的無名氏作者似乎熟悉寄暢園和樂郊等張氏之山背後的歷史，也體悟到前八十回中大觀園對張氏之山的模仿。他將當時流傳的秦王兩家復興的故事作為大觀園的結局，雖偏離了前八十回暗示的賈府等大家族一敗塗地的命運設定，却更加符合清初真實歷史，自有其文本內在的邏輯性和歷史外在的合理性。

這一結局，另產生了深刻的政治批判精神和另一種獨特的悲劇。正如部分學者所言，它諷刺性地揭示了專制皇權主宰着所有人的興衰榮辱，生殺予奪，皆由皇帝一念之間。前八十回設定了賈寶玉走投無路時選擇出家，難免有迫不得已之感。後四十回續書中其在家族振復後依然拋棄富貴生活，具有更大的決絕力量。^④它何嘗不是另一種更為深刻的“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三、稻香與夢覺：晚期張氏之山之於《紅樓夢》

大觀園的毀滅為《紅樓夢》中最具悲劇性的場景，曹雪芹在全書開篇就借甄士隱“陋室空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第22頁）對此作出預言。值得注意的是，甄士隱居蘇州，他所目睹經歷的，更多為江南一帶的衰亡。曹雪芹此舉，是暗示賈家必然遭遇江南大家的命運。

張南垣在清初已經意識到以張氏之山為代表的園林仿佛化為江南望族命運多舛的象徵。他曾對吳偉業言：“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荊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為之營置者，輒數見焉。”^⑤清初江南文人此類文字，飽含興亡之悲。王世貞曾孫王昊哀歎王世貞的弇山園在清初的敗落：“煙生衰草空堂黑，日轉頽牆老樹黃。栗里衣冠時喪亂，蘭亭筆墨事淒涼。”^⑥王時敏在《樂郊分業記》中回首昔日張南垣為己所建之樂郊園，“郊垌兵燹，斯園幸留，垣闔雖猶僅存，扃鐃非復如故，獷夫連臂，雜種拉攏，朱欄叢曲，惟聽呼鷹，碧沼清漪，只供飲馬……撫今追往，慘目傷心。”^⑦園林原為世外桃源，但在明清易代的激烈摧殘下，園林已岌岌可危，無法避世。秦松齡在憶寄暢園時，猶慶幸“水石能垂護，風霜幸保全”，^⑧王時敏却直接發出“豈有仙源在近郊”^⑨、“避世難尋源水桃”^⑩的悲涼。吳偉業曾畫有《桃源圖》，表達了對隱逸的渴望，但他却在順治十一年（1654年）所作的《退谷歌》中驚呼：“武陵洞口聞野哭，蕭斧斫盡桃花林。仙人得道古來宅，劫火到處相追尋。”^⑪

《紅樓夢》是對四大家族驕奢淫逸的懺悔，上述明清之際的園林主人們也並未將樂園的毀滅僅僅歸結為兵火侵銷等外因，而是具有深刻的內省精神。他們入清後借助夢的意境在藝術創作和現實中營造出農舍式園林，對昔日樂園所象徵的晚明靡費無度和自身的政治屈節作出了曲折幽隱的反思，這其中就包括西田和梅村等晚期張氏之山。晚明崇尚奢華，“高堂廣廈，罔思身後之圖”。^⑫江南競相造園，王時敏在記述明末聘請張南垣改建樂郊園時，對自己當年揮霍無度進行了幾乎聲淚俱下的痛訴：“適雲間張南垣至，慫恿為山甚力……吾時正年少，腸肥腦滿，未遑長慮，遂不惜傾囊聽之……不惟大減資產，心力亦為憔悴……傳示子孫，俾知半生拮据，情賞攸托云爾。”^⑬作為對此的救贖，歸隱農家樸素生活變為一種理想乃至夢想。順治十三年（1656年）南北各有一幅憧憬世外桃源的畫作問世，其中一幅更被命名為《夢境圖》。吳偉業是年在北京創作有《桃源圖》，圖中農舍田園風光，遁世之意一覽無餘。身在蘇州的王鑑在其《夢境圖》中描繪了他夢見自己跌坐在王維的輞川別業中，而有別於歷代輞川題材畫作中崇樓高閣的輞川別業，王鑑所坐的輞川別業為數間草堂。數年之後，這位王世貞的曾孫在現實中再現了這一夢境，他於順治十七年重返先祖弇山園遺址，建造了僅有兩楹“僅可容膝”的小舍，“從此閉關，日坐蒲團”。^⑭王時敏受邀為這一房舍題名為“染

香”，他本人則痛感自己一生“始腴末瘠”，立志“痛洗綺襦紈袴之習，亦欲自拔於流俗塵鞅之外”。^⑤他早在順治八年就已遠離樂郊園，並自號歸村老農，請張南垣在十里之外另築西田，“誅茅覆宇，丹雘罕加。竹屋繩床，類岩穴之結構”，其中“燕處之庵，顏曰稻香”。^⑥

然而，歸農避世只是這些建築的表象。吳偉業稱王時敏歸隱西田“人服公之天資夷曠，而不知其寄託則同深遠矣”，^⑦李安源在考察江南清初遺民盛行改建草堂陋庵的行為後指出，其寄託着清初遺民複雜的心態，“與晚明競逐奢華之舉形成鮮明對照……更主要則是士人階層集體反思的結果，即所謂的‘築陋室以明志節’，實是清初士人心態的物質外化”。^⑧這也是吳、王等曾在清兵南下時太倉開城迎降的一代文人心內掙扎的寫照。吳偉業言西田地況極差，並不具備自給自足的生產功能：“陂渠湮廢，烏鹵沈斥，沮洳污萊，歲頻不登，賦以日急，居此土者，亦何樂乎有耕？”^⑨它亦不具備真正的逃避功能——吳偉業畫作《桃源圖》晚於其哀歎桃源毀滅的《退谷歌》出現，而如上文所述，吳偉業和王時敏早已意識到在嚴酷的現實中，世間已無桃源。李安源通過研究王鑑《夢境圖》對王維的思慕後指出，王鑑引入王維這一身陷偽朝而心懷唐室的人物，既為自己屈節而備受煎熬的心靈尋求慰藉，又使桃源的歸隱主題隱晦地表達了對清朝的消極抗拒。^⑩值得注意的是，王維也成為部分張氏之山的主人們的精神寄託。吳偉業的《桃源圖》為順治十三年創作，時值作者被迫入京出仕清朝；《桃源圖》後另錄王維的《桃源行》，詩中更借“居人未改秦衣服”一句影射對剃髮易服的抗拒。王維在安史之亂中《凝碧池》“秋槐葉落空宮裡”的秋槐意象成為心懷故國的象徵。王時敏的西田被同時代人吳偉業、歸莊、蒼雪、王士禛等多次喻為輞川，^⑪錢謙益稱西田之境界為“大田卒獲，甯無周京離黍之思……詠右丞《秋槐》之詩，流連圖畫”。^⑫王時敏本人潛居西田時寫下“宮槐葉落迷芳苑”，^⑬“每詠秋槐倍愴神”等句。^⑭其心態固有“往事淒涼難再說”的悲感，^⑮也含着對秘密收藏的前朝聖旨的暗指——“惟藏宸翰茅茨裡，長有祥雲擁玉函”，^⑯更偶爾閃過類似辛棄疾“醉裡挑燈看劍”的不甘——“含愁默默支頤坐，匣劍依然夜吐芒”。^⑰潛居西田，並非遁入世外桃源，而是此身無力逃脫之時，通過茅舍陋室抒發心靈的自省和最後的堅守。

西田避世表象下遺民複雜的心態在王時敏《七十自詠》中得以充分表述，而它最終和夢境相聯繫：“恩波太液浩無津，每詠秋槐倍愴神。竊祿王朝叨法從，偷生七袞愧遺民。身因頑健翻為累，時際艱難轉幸貧。傳笏常年稱盛事，夢華今已隔前塵。”^⑱陋室空堂中，前塵回首，當年笏滿床的繁華如夢般幻滅。錢謙益直接指出王時敏的西田具有覺夢的特質。“生住異滅，惟一夢心……西田一畝之宮，劫火近銷。兵輪遠屏，此世界中之四禪也……華觀沉灰，瓊台驟雨，如夢中事，豈足問哉！”^⑲所謂佛家四禪即無憂無樂、通透智慧境界。儘管“回首前程噩夢長”，^⑳王時敏最終將自身比為出世的“飄笠翛然老衲如”，渴求能達到齊物為一的解脫境界：“但能齊物忘憎愛，高枕松風夢亦遽”。^㉑在這樣的境界中，“繁華昨夢等閒過”^㉒、“蝸舍溪邊只自謀”。^㉓吳偉業在明朝崇禎年間邀請張南垣為其修建梅村，工程却直至清朝順治十四年才結束，最後一座完工的建築為鹿樵溪舍。^㉔這一舍名典出列子，鹿在樵夫、路人等手中輾轉，得失者都以為自己在做夢。明朝車任遠劇作四夢之一為《蕉鹿夢》，其中尾聲為，“莫把荒唐做紙上看……為看蕉鹿終何在，到底都如夢中人”。^㉕

白居易讀列子後寫下，“假使如今不是夢，能長於夢幾多時”。^㉖歸莊老農王時敏的西田或稻香庵具有“誅茅覆宇……竹屋繩床，類岩穴之結構”，是樂郊毀滅後的轉世和園林主人夢醒之地。曹雪芹謂其《紅樓夢》“滿紙荒唐言”（第9頁），更在第一回直言，正是對往昔“錦衣紈袴時，飫甘饜肥之日”的懺悔覺悟，才有“茆椽蓬牖，瓦竈繩床，亦未有防（妨）我之襟懷筆墨者”的釋然，繼而得以用“‘夢’，‘幻’等字”，作為“此書立意本旨”（第4頁）。大觀園中，稻香老農李紈所居住的稻香村“黃

泥築就矮牆”、“數楹茅屋”、“紙窗木榻”，無疑是大觀園突兀的異類，在賈政眼中，它與大觀園中其他“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的建築形成鮮明對比。賈政承認它“係人力穿鑿”，賈寶玉則認為其“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第357~360頁）。

在此，稻香村猶如福柯所說的異托邦。異托邦同存於現實、對稱於現實而又異於現實，“它與其他場域是矛盾的關係……和其他場域是再現、挑戰和顛倒的關係”。^①柯律格對明代早期園林中的農業生產部分的在場和退場進行過類似思考，他認為農業生產部分象徵着道德教化，是遊藝型園林的異托邦。^②而稻香村之於大觀園，就是這一異托邦的另一種方式的降臨——本應在大觀園毀滅後作為其對立面出現的稻香村，却提早降臨在大觀園中，成為這美夢中的夢魘。仿佛某位洞悉其樂郊和西田等家族園林作品歷史命運的山子張，利用這一另類建築，對一夢不覺的賈府和“盛世”暗示着太多不能說、不忍說的秘密。

這就為我們重新思考紅樓夢的社會政治問題及其複雜性開闢了新的空間。作為索隱派代表，蔡元培早年提出的《紅樓夢》民族主義傾向頗受質疑。既然“‘築陋室以明志節’，實是清初士人心態的物質外化”，它既微妙地表達了對晚明反思和懷念又暗含着對清朝的疏離，被時人視為特殊歷史和悲劇寓意的符號象徵，而《紅樓夢》引入這一符號，是否以一種隱晦的方式表達了某種民族主義？

如果考慮曹雪芹包衣身份，他對明朝不會有強烈的情感。但如果考慮其家族類似於江南張氏之山的悲慘遭遇，他更多的是以一種理解同情的方式將清初遺民陋室對前朝奢靡亡國的反思轉化為對當下的警告。稻香村在歸隱的表象下，暗喻着那段明清易代的慘痛和晚明繁華奢靡一去如夢的悲涼。《紅樓夢》成書的時代正是康雍乾三朝在京郊大肆營建“三山五園”之際。^③在賈府和整個“盛世”時代正走向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高潮之時，稻香村的出現徑直揭示了它們之後必然敗亡的末世景象。甚至作為大觀園的一部分，稻香村不再是後者的退身，而必然隨着大觀園一起毀滅。清代二知道人寫道：“雪芹所記大觀園，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記之桃花源也”。^④在這層意義上，稻香村繼承了吳偉業等張氏之山主人“蕭斧斫盡桃花林……劫火到處相追尋”的世間已無桃源可退的徹底悲劇意識，它呼應了太虛幻境《飛鳥各投林》中“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預言。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陸建德、戚世雋、唐均等教授的多次指導，特致謝忱。]

①王慧：《大觀園研究綜述》，北京：《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2期。

②俞平伯：《〈紅樓夢〉地點問題底商討》，《俞平伯全集》第5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422頁。

③④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粟編：《紅樓夢卷》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85頁。

④俞平伯：《〈紅樓夢辨〉的修正》，《俞平伯全集》第5卷，第290頁。

⑤⑧藏雲：《大觀園源流辨》，天津：《大公報》，1935年7月14日第11版。

⑥馮其庸：《〈紅樓夢論集〉序》，北京：《紅樓夢學

刊》，1984年第1期。

⑦本文《紅樓夢》引文均出自：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以下皆隨文標註頁碼。

⑨⑫柯律格：《蘊秀之域——中國明代園林文化》，孔濤譯，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84頁，第44頁。

⑩王世貞：《太倉諸園小記》，《婁東園林》，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257頁。

⑪佚名：《婁東園林志》，陳從周、蔣啟璠編：《園綜：新版》上，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02頁。

⑫蒼雪：《柴桑徑》，楊為星注：《蒼雪大師〈南來堂詩

集》詩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9頁。

⑬蔡義江：《紅樓夢與浙江》，《追蹤石頭——蔡義江論紅樓夢》，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322頁。

⑭⑳戴名世：《南山集》卷七《張翁家傳》，《續修四庫全書·一四一九·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3頁；第143頁。

⑮曹汛：《張南垣的造園疊山作品》，北京：《中國建築史論叢刊》，2009年。

⑯趙爾巽等：《清史稿》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57頁。

⑰⑱⑲王時敏：《樂郊園分業記》，《王時敏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88頁；第88頁；第88~89頁。

⑳㉑陳夢雷等輯：《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三百九十一卷，清雍正銅活字本，第28722頁。

㉒㉓陸燕詰：《張陶庵傳》，吳定璋輯：《七十二峰足徵集》，清乾隆十年吳氏依緣園刻本卷十，第2280頁；第2281頁。

㉔藏雲：《大觀園源流辨》，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第468~469頁；李希凡：《中國古典小說論叢》，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4年，第488頁。

㉕㉖計成：《園治注釋》，陳植注，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1年，第57頁；第71頁；第36頁。

㉗曹汛：《造園大師張南垣——紀念張南垣誕生四百周年》，《中國造園藝術》，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262~263頁。

㉘愛新覺羅·胤禛：《世宗憲皇帝御制文集/附總》卷二十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589頁。

㉙愛新覺羅·弘曆：《御制詩初集》卷二十二，《清代詩文彙編第二輯》，清乾隆嘉慶武英殿刻本，第698頁。

㉚㉛㉜吳偉業：《張南垣傳》，張潮輯：《虞初志合集之二·虞初新志》，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第82頁；第81~82頁；82~83頁。

㉝趙翼：《簞曝雜記》卷五，清嘉慶湛貽堂刻本，卷二，第83頁。

㉞顧凱考證，晚明張南垣之前的中國園林，崇尚方

池。顧凱：《中國古典園林史上的方池欣賞：以明代江南園林為例》，北京：《建築師》，2010年第3期。

㉟于安瀾編：《圖繪寶鑒續纂》，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第45頁。

㊱黃與堅：《西山秦氏寄暢園》，秦志豪主編：《錫山秦氏寄暢園文獻資料長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第81頁。

㊲孔尚任：《游秦太史園》，秦志豪主編：《錫山秦氏寄暢園文獻資料長編》，第91頁。

㊳邵長蘅：《遊慧山園記》，秦志豪主編：《錫山秦氏寄暢園文獻資料長編》，第84頁。

㊴吳偉業：《惠井支泉》，《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2頁。

㊵秦實然：《恭和禦制寄暢園詩元韻》，秦志豪主編：《錫山秦氏寄暢園文獻資料長編》，第112頁。

㊶張英：《南巡扈從紀略》，秦志豪主編：《錫山秦氏寄暢園文獻資料長編》，第92頁。

㊷《秦德藻年表》，秦志豪主編：《錫山秦氏寄暢園文獻資料長編》，第108頁，第98頁。

㊸㊹秦蕙田：《陳情表》，秦志豪主編：《錫山秦氏寄暢園文獻資料長編》，第108頁，第108頁。

㊺秦道然等：《寄暢園改建祖祠公議》，秦志豪主編：《錫山秦氏寄暢園文獻資料長編》，第108頁。

㊻㊼王時敏：《自述》，《王時敏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95~96頁；第96頁。

㊽王時敏：《分田完賦志》，《王時敏集》，2019年，第99頁。

㊾王時敏：《丙午四》，《王時敏集》，2019年，第160~161頁。

㊿鄒少雄：《論〈紅樓夢〉中的“沐皇恩”“延世澤”》，武漢：《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5期。

㊱王昊：《弇園》，汪學金輯：《婁東詩派二十八卷》卷十五，清嘉慶九年詩志齋刻本，第490頁。

㊲秦松齡：《見雙樹忽憶寄暢園》，秦志豪主編：《錫山秦氏寄暢園文獻資料長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第908頁。

㊳王時敏：《西田感興·其十二》，《王時敏集》，2019年，第88頁。

㊴王時敏：《乙巳九月之望，邀吳梅村諸公郊園小集，承麋涇九日以佳什見投，漫賦俚言奉謝》，《王時敏

集》，第 76 頁。

⑤⑤ 吳偉業：《退谷歌》，《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301 頁。

⑤⑥ 鍾化民：《救荒圖說》，《中國荒政書集成·第 1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

⑤⑧ 王鑑：《王鑑畫論譯注》，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3 年，第 63 頁。

⑥⑥⑦③ 錢謙益：《西田記》，《婁東園林》，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年，第 262 頁。

⑥① 吳偉業：《歸村躬耕記》，《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882 頁。

⑥②④ 李安源：《王鑑〈夢境圖〉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3 年，第 77 頁；第 50~95 頁。

⑥③ 吳偉業：《王奉常煙客七十序》，《吳梅村全集》，第 781 頁。

⑥⑤ 耿晶：《“每詠秋槐倍愴神”——王時敏的身份焦慮、互文想像與自他認同》，瀋陽：《美術大觀》，2023 年第 9 期。

⑥⑦⑦⑦ 王時敏：《西田感興·其二十》，《王時敏集》，2019 年，第 37 頁。

⑥⑧⑦② 王時敏：《七十自詠》，《王時敏集》，第 63 頁。

⑥⑨ 王時敏：《西田感興·其十九》，《王時敏集》，第 36 頁。

⑦⑩ 王時敏：《西田感興·其二十三》，《王時敏集》，第 37 頁。

⑦⑪⑦④ 王時敏：《西田感興·其十六》，《王時敏集》，2019 年，第 36 頁。

⑦⑤ 王時敏：《西田感興·其四》，《王時敏集》，第 34 頁。

⑦⑥ 王時敏：《西田感興·其十四》，《王時敏集》，2019 年，第 35 頁。

⑦⑧ 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 年，第 116 頁。

⑦⑨ 車杞齋：《蕉鹿夢》，沈泰編：《四庫家藏·盛明雜劇》二，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第 595 頁。

⑧⑩ 白居易：《疑夢二首》，周振甫編：《唐詩宋詞元曲全集》第 9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9 年，第 3314 頁。

⑧① Michelle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in *Diacritics*, Vol. 16, No. 1, (Jan., 1986).

⑧③ 萬依：《乾隆時期的園囿》，北京：《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 年第 2 期。

作者簡介：范若恩，中山大學國際翻譯學院和中文系特聘副教授，博士。廣東珠海 519082

[責任編輯 桑 海]